

你可能不知道的唐长孺先生

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

唐长孺先生离开我们已 22 个春秋有余。在学术圈外,似有许多人不知唐先生是谁。在学术圈内,有些人只知唐先生的一面。在采访唐先生的 10 余位工作伙伴、学生、家人时,记者常有“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一个人”的疑惑,在访谈中不断“刷新”着对唐先生的人物设定。而在结合时代背景对各种事件进行爬梳后,这位老先生的形象逐渐清晰……

“出力最多”的党员

读了不少纪念唐长孺先生的文章,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唐先生的思想觉悟极高。这个印象基本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中华书局点校“北朝四史”时的往事,主要由当时书局编辑们的回忆及唐先生弟子们的口耳相传构成。

在中华书局的老编辑们看来,唐先生是点校“二十四史”的高水准学者中,表现相当突出的一位。一是因为他参与点校的时间长。中华书局编审、《魏书》点校本责任编辑魏连科说:“点校‘二十四史’出力最多的当属唐先生。”当年赴京集中点校工作共分三个时期:1963 至 1966 年、1967 年、1971 年以后,“唐先生每个阶段都参加了”。而且,唐先生点校时特别专注,魏连科有次去找唐先生请教问题,走到他身旁唤了声“唐先生”,结果唐先生被吓了一跳,“后来我每次去找他,进门就故意先跟陈仲安先生聊几句”。中华书局编审、《晋书》点校本责任编辑张忱石告诉记者,唐先生点校时在学术上毫无保留,“有些人发现了问题不写进校勘记长编,为以后自己写文章做准备,唐先生不靠这个”。他

还记得,1972 年唐先生完成“北朝四史”点校后,主动去找负责“二十四史”修订工作的赵守俨先生,问他还有什么需要做的。后来,唐先生又去帮忙点校加工了《晋书》载记部分。

二是唐先生在思想上的先进性,当时的先生们恐难有匹敌者。有两个流传甚广的例子:张忱石回忆,唐先生在 1970 年代借调至中华书局期间,每月上交党费高达 120 元,几近工资的一半。而唐先生的夫人王毓瑾从 1958 年起,就响应国家号召从武汉大学图书馆馆员任上退职,没有经济来源,家里还有孩子要吃用开销,再加上几十年来教师工资一直没涨,“唐先生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”。张忱石回忆,唐先生每顿饭都在食堂里吃,从来不下馆子。有次唐先生花 2 块钱从菜场买了虾,请张忱石烧给他吃,“那是我印象里他最奢侈的一次”。而且,唐先生的衣服也破破烂烂,袖口上的棉花都露出来了。不过,唐先生的弟子、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冻国栋告诉记者,唐先生那时交的党费是每月 50 元。记者在唐先生家中见到了一张写满“五十元正”的“1972 年商务/中华缴纳党费收据”。对此,有人认为可能唐先生在不同时段缴纳了不同数

额的党费,有人认为可能信息在传输过程中出错,但即使每月缴纳 50 元党费,尤其就唐先生这样的家庭条件来说,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。

另一个例子来自魏连科的回忆。1970 年代“二十四史”点校工作在王府井大街 36 号展开,外调专家和书局的单身汉们都住在楼里。书局安排了一名清洁工专职打扫楼道等公共部位,但唐先生和他的助手陈仲安先生总是起得很早,经常在 8 点前清洁工还没到时,就已打扫好了楼梯、楼道,连扶手都擦拭干净,“真让我们这些睡懒觉的年轻人脸红”。

此外,还有一些例证。张忱石说,他曾看过 1963 至 1965 年“翠微校史”时期的局史档案。其中有天记录道,唐先生对书局安排照顾点校专家们生活的小高发了脾气,因为小高在准备晚饭时,关照厨师给牙疼得厉害的唐先生做了香椿拌豆腐。“唐先生一看这是对他搞特殊照顾,当时就发火了,不管谁劝,他都坚决不肯吃。”小高后来还因此被领导批评了。

张忱石记得,1966 年“翠微校史”工作被喊停时,外调专家是陆续回原单位的。1966 年 5 月 23 日,傅斯年先生的侄子、原



唐长孺先生

本负责点校《金史》的傅乐焕先生投湖自尽。这时仍有不少专家住在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,消息传来,人心惶惶。“唐先生是党员,领导就派他去给老先生们做思想工作。唐先生就去找他们一个个谈话,特别是像罗继祖先生这样思想负担比较重的老先生,告诉他们有什么就跟群众交待,群众一定会帮助他们的。”

1971 年,姚文元给周恩来写信建议恢复“二十四史”的整理点校工作,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。魏连科说,当时包括唐先生点校的《周书》在内的几部史书已经整理得差不多,但由于“文革”前的前言是作技术性交代,而此时则要求前言必须有“批判性”,所以很多书的前言都得修改。但这类前言遣词造句很难把握,很多老先生也不知道怎么写。等唐先生重写完《周书》前言,大家一看,里面既有学术性,又批判了天命论、唯心论,“《周书》前言马上被当作范例,大家都照着写”。

还有一件多人提到的事,是唐先生 1961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,主动与父母划清了界限。唐先生家是江苏吴江平望当地望族,母亲是浙江吴兴南浔人,她的堂兄刘承干是近代藏书家和刻书家。刘家的“小莲庄”、“嘉业堂藏书楼”至今仍是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南浔古镇首推的两大景点。但有这样的家庭背景,在特殊年代绝不是什么令人称道的事。据说,唐先生入党后,特地从武汉到上海接父母去杭州游玩了一天。末了,他对父亲说,今后他

不再给他们寄钱了,他已与二弟唐仲孺商量好,以后就由二弟负担。张忱石记得,1971 年点校“二十四史”时,唐先生与王仲荦先生交好,一日王先生聊天时随口问了句:“你家老太爷可好?”唐先生即表情严肃地请王先生以后不要再提这些。直到 1983 年有次转车到上海时,唐先生才和家人取得联系。

武大唐门弟子们多记得,1983 年 8 月至 9 月,唐先生在赴日参加国际会议期间,前往东大出版社和琳琅阁书店等地,用讲课费购买了大量日版书,回国后悉数捐赠给了刚刚成立 2 年的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资料室。

诗词、家信里的另一面

有人说,唐先生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,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暴,“属于思想改造得比较彻底的”。那么,没有被改造的唐先生是什么模样?所幸唐先生的弟子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 2014 年通过唐先生的次子唐刚卯,找到了唐家留存至今的大量手稿,并于去年整理出版了《唐长孺诗词集》一书。在书中,可以结合冻国栋编写的《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》读到唐先生的生平记事,以及他从 23 岁开始所写的部分诗词、文稿。在这些材料之外,记者采访了不少唐先生的弟子、家

(下转 6 版) ➔

唐先生和他的亲友圈

1911 年,唐先生出生于江苏吴江平望镇,平望唐氏是当地的四大望族之一。今天,我们仍能看到民国五年 6 岁的唐长孺与姐妹二人的合影,照片空白处为唐先生的父亲唐耕余先生题影诗(见左图)。

唐耕余与妻子刘蕴玉共育有子女 7 人,除了女儿“圆”早夭、儿子叔孺病疫于战争期间,其他 5 人的情况如下:长女素心,嫁上海恒丰银行老板王星齐之子王春浦;长子长孺,娶同乡女子王毓瑾;次子仲儒,娶新加坡华侨巨商陈嘉庚外孙女林美美;次女露葵,嫁柳亚子同族之侄、晚明史家柳义南(原名柳于意);三女季雍,嫁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金克木。

1946 年,武汉大学回迁武汉后,外文系的周煦良、历史系的唐长孺、哲学系的金克木、中文系的程千帆,四位教授时称“珞珈四友”。据金克木回忆文章,雅俗合参,古今并重,中外通行,是他们的共同点。(整理/单颖文)